

明中后期天主教士中国交游考

张永刚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明嘉靖间天主教开始传入中国,经过利玛窦等天主教士和素有“天主教三大柱石”之称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东林党人的共同努力,中西两大文明有了短暂的交流,但“南京教案”的发生使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短暂的消歇。

[关键词]利玛窦;天主教三大柱石;东林党;南京教案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24(2006)01-0089-04

16 世纪中叶,当大明帝国步入嘉靖时代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走近了垂暮之年,长期的闭关锁国使封建王朝丧失了冒险和进取精神。催生社会巨变的因子——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手工业发达的江南滋生暗长,古老的中华文明面临了新的挑战。与此同时,在西方,近代化的科技文明以冒险和积极进取的姿态迅速向全世界扩张,中西两大文明的碰撞在所难免。在这中间扮演重要角色的一方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而另一方则是明王朝内部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开明的知识分子,而这其中东林党人成为勇立时代潮头的急先锋。他们的交往促进了中西两大文明的交流,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他们却不得不面临来自各自一面所带来的阻碍,这就是“将欧洲文明视为文明终结,将一切非天主教民族都视为魔鬼的‘欧洲人主义’者和狭隘的亚利安‘民族主义’者”以及“将宋明理学当作唯一真理,主张‘宁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顽固卫道士”。归根结底,焦点在于“要使中国的天主教信徒‘西方化’,还是要使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中国化’”。^[1]这使他们之间的交流变的异常艰难,在利玛窦之前的传教士沙勿略、范礼安和罗明坚都没有取得成功,但在利玛窦和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开明士人的共同努力下,这块坚冰终于被突破了。

沙勿略(1506-1552),西班牙人,1540 年入耶稣会。嘉靖年间,他在日本传教,深受儒学影响的日本人问他:“如果你们的宗教是真理,为什么作为一切智慧之源的中国人没听到它呢?”^[2]^[18]这使他意识到中国的儒学对东亚文化圈

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沙勿略因此决心进入中国传教。嘉靖三十一年(1552),这位享有宗教特权的传教士登上了广东海外的上川岛,但明帝国的海禁使近在咫尺的三十里海面却象难以逾越的屏障,令他只能望洋兴叹,他虽千方百计托人要求谒见广州提督,结果证明是徒劳的。饥寒交迫、身心交瘁的他于同年 12 月 3 日晨怀着永远的遗憾死在了这个岛上。留下的是他致“欧洲同会士”的六札信函。^[3]

第一函,致欧洲同会士,1546 年 5 月 10 日作于满刺加之安倍那。“满刺加有一葡商,新从名为支那的大国归来……”

第二函,致欧洲同会士,1552 年 1 月 29 日发出。“日本所有宗教皆自邻国传入,国名支那。”

第三函,同日致欧洲同会士。“日本有一板东大学(按:板东今名关东),规模宏大,僧侣颇多,研究教义和各宗派学说,但所有宗派与教义无不传自中国”,“我准备今年前往中国京都,因为,如谋发展吾主耶稣基督的真教,中国是最有效的基地。”

第六函,1552 年 10 月 22 日自上川岛发出。报告安抵上川岛。上川离广州三十里。广州人纷来访问,他一再请求广州人带往广州,均遭拒绝,因广州提督严禁通番。

沙勿略于 11 月 12 日再发一函,也是他去世前的最后遗札,函中略说:“闻中国皇帝有意改行新政。又明言由此岛前往中国,困难万状,且极危险,亦不知是否能成功,但希望能顺利达成。倘若今年不能赴广州,即往星罗,如明年仍不

[收稿日期]2005-05-17

[作者简介]张永刚(1977-),男,山东枣庄人,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教师,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晚明政治与文学。

能去中国,当返回印度。然而我渴望到中国去。”

范礼安(1538—1606)意大利人,耶稣会印度巡察使。1574年,他来到了澳门,经过九个月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天主教进入中国的新的构想。在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他说:“渗入中国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调整我们的策略,而采取一种与迄今为止我们在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方法。”他认为,“必须放弃对中国教徒的‘葡萄牙化’政策,而代之以外国传教士的‘中国化’。”^[1]

罗明坚(1543—1606)意大利人,1580年(万历八年)来华,距沙勿略卒年已有二十八年,但早于利玛窦二年。罗明坚是外国传教士中首先到内地居住的。他先到了广州。万历十年十二月到肇庆,住东关某佛寺。这里可称之为中国内地第一所耶稣会会院。万历十二年,他首先以汉字汉文撰写《天主圣教实录》宣传天主教义。万历十三年,应两广总督郭应聘(字君实,莆田人)之邀同麦安国神父到浙江绍兴。郭的父亲也受了洗。地方官宴请二位神父。二神父逐日为大家讲解教义。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云:“从16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的国际处境就已经相当尴尬和奇特。一方面,在传教士及其象征的西洋文明面前,汉族文明所设定的‘天下’观念逐渐瓦解,受到‘世界’的冲击,‘中国笼罩天下’的观念逐渐瓦解,受到‘世界’的冲击,‘中国正由笼罩天下’的‘中心’变成了‘万国’中的‘一国’,而另一方面,在四边强敌环伺之下,‘中国’又先后受到‘满夷’或‘辽夷’、‘建州夷’从北方;‘倭’从东方;‘西夷’从海上的入侵。说起来,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知识、思想与信仰上,都已经显露出了岌岌可危的征候。这种微妙的、不易察觉的趋势,对于一般思想界来说,也许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但是对于相当敏感的士人来说,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压迫感’或‘异样感’,却使他们始终处在一种难以言说的心情中。”^[4]与此前的他人相比,利玛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利用自然科学,特别是地理和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可以打开中国人的眼界,破除他们的‘中国中心论’,进而可以为传播基督福音做些准备工作。”^{[5] (P62)}在利玛窦和“敏感的士人”东林党为代表的开明士绅的共同努力下,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序幕由此拉开。

利玛窦(1552—1610),字西泰,意大利人。万历十年罗明坚进入广东肇庆。受范礼安的指示,确立了一条与佛僧认同的传教路线,他让传教士穿上僧服。而他们也自称为“西和尚”,并且用佛教术语“庙”来称呼他们的教堂。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在日本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事与愿违,在中国却是行不通的。万历十一年,利玛窦随罗明坚入肇庆。在肇庆的日子里,他努力去掌握中国的语言,去适应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努力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利玛窦敏锐地发现,必须与统治中国的儒学和士大夫寻求结合点和共同兴趣。为此,他说服了他的上司,改穿儒服,行秀才礼。当他第一次穿上儒家的礼服,与他的中国朋友坐在一起时,利玛

窦后来写道:“我们的朋友们也非常高兴。”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往,利玛窦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以此,他得到了士大夫们的好感,与他们展开了积极的交往。他逐渐意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教,“必须先得到皇室或其主要顾问官的许可,否则不能进入内地。”^[6]而上层的官员都是信奉儒教的。因此,他采取以儒学传教,走上层路线的传教策略。万历十六年(1558),利玛窦接任罗明坚主持耶稣在华事务,开始全面实施他的以儒传教的策略。

万历二十三年(1595),在写给罗马耶稣会总长的信中(时利玛窦在南昌),利玛窦总结了中国人访问其住所的五个原因:一、他是从欧洲来的外国人;二、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三、瞿太素到处宣扬他是位大数学家;四、他带来的一些东西,如三棱镜、地球仪、浑天仪、世界地图;五、最后的原因才是想听教会的道理,并与之交换意见,但因这个原因拜访他的人极少。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他感兴趣的主要原因还在于西方的科学技术。早在肇庆时,知府王泮对利玛窦挂在墙上的世界地图颇感兴趣,亲自督印了第一个中文版的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这幅地图后来流传颇广。曾自制过地图的李之藻,在北京见到该图后,立即接受了此图中的地理观,并因此成为利玛窦的密友。通政司许晋臣是当时新教徒中官阶最高的人。传教士王丰肃为他做了一架浑天仪,并赠送一幅《坤舆万国全图》。许氏对此颇感兴趣,王丰肃进而对他说:“到目前为止,你所学的,与天主教的信德奥秘相比,那真是雕虫小技而已。膜拜天主往往超过观赏星辰……”许氏因而入教。对此,利玛窦不无自豪的说:“利用科学使中国人入教,这是最好的例子。”在后来皈依的教徒当中,像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些都是当时有影响的朝中大员。除此而外,还有一品官员14人、进士10人、举人7人、秀才300人,皇室成员140人、内侍40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入京,“谨以原携本国土物,所带天主图像一幅,天主母像两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两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等物”^[7]献给明神宗,神宗因而命人以礼宾之,允许其居住在北京。

利玛窦最初交往最深的是潮州知府瞿太素。艾儒略在《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中这样评价瞿太素:“姑苏瞿太素,大宗伯文懿公之长子也。适过曹溪,闻利子名,因访焉。谈论间,深相契合,遂愿从游,劝利子服儒服。”^[8]在离开广州,前往南昌时,利玛窦听从了瞿太素的建议,换上了儒服,这是一个信号,是他希望通过崇儒抑道的策略,来获得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持。在这一点上,利玛窦与当时朝中的重要政治力量东林党人达成了思想上的协调。李贽主张“三教合一”、“儒释道之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9]遭到了东林党人高攀龙的批判,“孔子道无亏欠,本不须二氏帮补。”^[10]东林党人礼部侍郎冯琦在与利玛窦的交谈中,极力铺陈人世之苦,然后慨叹:“然则人之道人犹未晓,况于他

道？而既从孔子，复由老氏，又从释氏，而折断天下心于三道也乎？^{〔11〕}利玛窦的崇儒抑佛，与东林党人对佛道的批判达成了一致，进而将士大夫引向“学上帝正德”的道路，“于以三从三教，宁无一教可从。无教可从，必别寻正路……不学上帝正德，而殉人梦中说道乎”^{〔12〕}利玛窦与东林党人的交往是保证其在中国传教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当时著名的东林党人有很多与利玛窦有过交往。他们或为传教士的中文著作撰序（如叶向高、曹于汴、冯应京），或引传教士至各地传教（如叶向高、徐光启、杨廷筠），或在一片排外禁教声中通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使“稍宽其禁”（如蒋德）表现出开放和自信。

李日华（1565—1636），字君宝，浙江嘉兴人，万历壬辰（1592）进士，被誉为万历、天启年间仅亚于董其昌、王惟俭的博物君子。他曾于丁酉（1597）秋在南昌见过利玛窦。李氏称利玛窦为善人，并叹利氏之奇，云：“彼真以天地为阶，死生为梦幻者，较之达磨流沙之来，抑又奇矣。”^{〔13〕}邹元标（1551—1624），字尔瞻，江西吉水人，东林党重要成员，《东林点将录》称之为天伤星武行者。在稍稍了解天主教之后，便作出了一种“古已有之”的判断，《答西国利玛窦书》云：“得接郭仰老（郭居静），已喜出望外，又得门下教，真不啻之海岛而见异人也。门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学行中国，此其意良厚。仆尝窥其奥，与吾国圣人语不异，吾国圣人及诸儒发挥更得详尽无余，门下肯信其无异乎？中微有不同者，则习尚之不同耳，门下取易经读之，乾即曰统天，不知门下以为然否？”^{〔14〕}

冯应京（1555—1624），字可大，安徽盱眙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冯氏耿介不阿，任湖广佥事时，与税监陈奉进行坚决斗争，后被诬入狱。冯氏“学求有用，不事空言”。在湖广任职时，曾派学生刘氏去江西、南京寻利玛窦为师，研习数学。当冯氏被诬入狱，利玛窦去看冯氏，二人之交从此开始。冯应京曾自费刻印利玛窦《交友论》，并为之撰序，尊称利玛窦为利子、西泰子。还曾为《天主实义》和《二十五言》撰序，并于1602年入教，1601年偶读《天主实义》，大为感服，代作为序，次年受洗。^{〔15〕}还令全家人信教。

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福清人（今福州），万历十一年进士。曾任万历、天启两朝之内阁首辅。《东林点将录》列其为“天魁星及时雨”，为东林党在朝的代言人。叶向高曾为利玛窦在北京获得葬身之地出力。归田时（1624），他途径杭州，此年引艾儒略入福建传教，且与艾氏论道。

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号称天主教“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功不可没。《明史》有云：“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16〕}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上海人。万历三十一年（1603）入天主教，次年成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柏应理《徐光启行略》对徐氏入教进行了神喻式的解说：“庚子（1600）（光启）再入南都，知利玛

窦来自太西，因往候，略问其旨。归来得一梦，见一圆堂中，设有三台，一有像、二无像。既醒，不识何解，大以为异。癸卯（1603），又至南都访利先生，时利子已往都门，明坚罗先生出接，即引瞻天主像。罗子谓天主三位一体，兹则第二位降生为人之像，公忽忆前梦，始惊疑……”^{〔2〕}在徐光启看来，“先生（利玛窦）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则为象数。”^{〔17〕}万历四十四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惟连上三疏，要求排天主教，驱洋人。徐光启上《辨学疏稿》为天主教辩护，对天主教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臣累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知此诸臣最真最确。不止踪迹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且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18〕}1605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经过一年的辛勤工作，译完前六卷，“太史意方锐，余曰：止，请先传此，请同志者习之，果以为用也，而后计其余。”^{〔19〕}《几何原本》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刊行。利氏死后，《几何原本》甚至成为他在北京得到墓地的理由，《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对此有一段描述：“时（利玛窦卒后），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向高）曰：‘诸远方来宾者，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姑无论其他，即其所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矣。’”^{〔19〕}

李之藻（1565—1630），字振之，号凉庵，浙江仁和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工部水司郎中。李之藻与利氏交游较徐光启早，“万历辛丑，利氏来宾，余从寮友数辈访之。”^{〔17〕}阮元《畴人言》：“西人书器之行于中土也，之藻荐之于前，徐光启、李天经译之于后。三家者皆习于西人，亟欲明其术而惟恐失之者也。”^{〔20〕}万历三十三年，李之藻较徐光启译《几何原本》早一年开始从利玛窦译《浑盖通宪图说》。李之藻还编印了《天学初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介绍西学的丛书。利玛窦曾对杨廷筠赞赏李之藻与徐光启：“自吾抵上国，所见聪明了达之士，唯李振之、徐子先先生耳。”^{〔17〕}

杨廷筠（1562—1627），字仲坚，号淇园，仁和人，万历二十六年与沈惟连同年进士，累官顺天府丞。万历三十年，杨氏奉诏入京，除四川掌道事湖广道御史。在京都与利玛窦一见如故，“往予晤西泰利公京邸，与谭名理累日，颇称金兰。”^{〔21〕}万历三十九年，李之藻请郭居静、金尼阁入杭州传教，杨廷筠晤见两位传教士，遂受洗，“欣然叩其宗旨，既而恳觐主像，竦息瞻拜，恍若大主临而命之也，因延先生至家，厚礼之。”^{〔22〕}“三大柱石”中，杨廷筠传教著作最多，主要有《代疑篇》、《代疑续篇》、《天释明辩》、《泉鸾不并鸣说》、《西学十诚诠解》、《圣水纪言》等。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的，“南京教案”的发生是天主教义与本土思想伦理相激化的结果，几乎使利玛窦等人所作的努力化为乌有。万历二十四年二月，吴尔

成上《移南京都察院咨》：“南北礼卿参之，北科道参之，而南卿寺等巡视等衙门，各有论疏。”^[23]可见，天主教在中国所遭遇的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已然到了危机四伏的境地。而作为反对派，沈樵对天主教的攻击是最为激烈的。他前后上《参远夷疏》三通，从皇权与政治、地方秩序的维护等高度抨击了天主教，成为“南京教案”的发起者。从1615-1618的三年间，负责“南京教案”的官员写了大约20个文件来批判天主教。在1617年，沈樵在南京郑重宣告禁止崇拜耶稣：“该教的野蛮传教者称他是降生成人的天主”。^[24]虽然“天主教三大柱石”起而为天主教辩护，然而万历四十四年腊月十二日，来自皇帝的诏书，使他们的努力化为泡影：“王丰肃和庞迪我及他们的同伙将被送回他们自己的国家。因为他们传播不为人知的教义，因为他们以宗教为借口，图谋扰乱我们百姓平静的生活，煽动臣民造反，鼓动百姓与国家作对。基于上述原因，朕命令南京礼部告知应天府官员：对于这些外国人，无论在何处找到他们，都要在卫兵严密护送下，送到广东省的广州，从那里让他们平静的离开中国，回到自己的国家。”^[1]在北京的传教士庞迪我和熊三拔被护送出北京，而龙华民和毕方济则躲进了徐光启的府中避难。在南京，传教士遭到了非人的待遇，沈樵抓捕了病中的曾德昭，并拷打了王丰肃，然后用囚车将他们解往广州。沈樵还彻底摧毁了南京的教堂和会院。在南昌的传教士也转移到了建昌。而这时唯一安全的是在杭州，由于杨廷筠的庇护，杨廷筠的家成了几年内天主教希望的中心。“南京教案”发生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暂时告一段落，说明西方的思想和文明要想对中国固有的思想体系造成冲击和影响还需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参 考 文 献]

- [1] 邓恩. 从利玛窦到汤若望[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2] 孙尚扬. 基督教与明末儒学[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4.

- [3]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M]. 北京:中华书局, 1988.
[4]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5] 李文潮. 莱布尼茨与中国[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2.
[6] 裴化行. 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教志[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7] 张维化. 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8] 艾儒略. 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M]. 北京:上智编译馆, 1947.
[9] 李贽. 续焚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10] 高攀龙. 高子遗书[M]. 无锡刻本.
[11] 利玛窦. 畸人十篇[M]. 台湾影印《天学初函》本.
[12] 利玛窦. 天主实义[M]. 台湾影印《天学初函》本.
[13] 李日华. 紫桃轩杂纒[M]. 携李遗书本.
[14] 何俊. 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15] 方豪. 方豪六十自定稿[M]. 台北:学生书局, 1969.
[16]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17] 徐宗泽. 增订徐文定公集[M]. 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 1933.
[18] 吴相湘. 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M]. 台北:学生书局, 1966.
[19] 徐光启. 徐光启著译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20] 阮元. 畴人传·李之藻[M]. 上海:上海书店.
[21] 董其昌.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M]. 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
[22] 艾儒略. 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M]. 台北:台北辅大神学院, 1996.
[23] 周平方. 破邪集[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
[24] 柯毅霖. 晚明基督论[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 樊建莹]

A brief research in catholic missionaries travel and friends-making in China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ZHANG Yong-g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Catholicism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in the years of Jiajing in the Ming Dynasty.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catholic missionaries such as Li Madou and Xu Guangqi, Li Zhizao and Yang Tingjun, the so-called three major pillars of catholicism and members of party of Donglin with progressive ideological inclination, the two civilizations of the west and China exchanged transiently. But the occurrence of Nanjing Religious case made the spread of catholicism in China pause.

Key words: Li Madou; three major pillars of Catholicism; Party of Donglin; Nanjing Religious Case

明中后期天主教士中国交游考

作者: [张永刚](#), [ZHANG Yong-gang](#)
作者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刊名: [许昌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XUCHANG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6, 25(1)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24条)

1. [邓恩](#) [从利玛窦到汤若望](#) 2003
2. [孙尚扬](#) [基督教与明末儒学](#) 1994
3.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1988
4.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 2001
5. [李文潮](#) [莱布尼茨与中国](#) 2002
6. [裴化行](#) [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教志](#) 1936
7. [张维化](#) [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 1982
8. [艾儒略](#) [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 1947
9. [李贽](#) [续焚书](#) 1975
10. [高攀龙](#) [高子遗书](#)
11. [利玛窦](#) [畸人十篇](#)
12. [利玛窦](#) [天主实义](#)
13. [李日华](#) [紫桃轩杂缀](#)
14. [何俊](#) [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 1998
15. [方豪](#) [方豪六十自定稿](#) 1969
16. [张廷玉](#) [明史](#) 1974
17. [徐宗泽](#) [增订徐文定公集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 1933
18. [吴相湘](#) [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 1966
19. [徐光启](#) [徐光启著译集](#) 1983
20. [阮元](#) [畴人传·李之藻](#)
21. [董其昌](#)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
22. [艾儒略](#) [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 1996
23. [周马耳方](#) [破邪集](#) 2001
24. [柯毅霖](#) [晚明基督论](#) 1999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cxyxb200601023.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ba5e5eb7-4822-4f77-9418-9e4d0082d9f0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